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

陳芳妹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提　　要

臺南孔廟大成殿，高懸十三個御匾，以康熙的「萬世師表」年代最早，尺寸也最大。唯「萬世師表」御匾，不只見於臺灣，無論是當世或後世摹本，更廣泛分佈在中國各地孔廟，包括北京、山東闕里、江蘇江陰、浙江黃岩、廣東德慶、山西平遙、四川資中等。它也如跨海到臺灣般，在越南孔廟出現，但卻沒有出現在日本的湯島聖堂，甚或韓國。

就已出版的、有限的、但也有定量例證的萬世師表匾額，根據其書寫格式及書風分析，證實書寫風格已格套化。其間雖仍存有各種細微差異，可能是不同時代的摹本，並存於世的關係。但無論如何，萬世師表御匾等，已形成與孔廟難以分割的文化意象。這種文化意象，雖有一定的分佈範圍，但時空廣佈的程度，不容忽視。由於山東闕里的原始初版「萬世師表」御匾，在文革時已遭破壞，臺南孔廟如何以其珍貴的當世版本及其特有相關文獻資料，一方面反映臺灣歷史及文物史，同時另一方面也反映清初康熙皇帝如何史無前例地將其政治符號進駐孔廟神聖空間，並散佈各地孔廟，形成與大清帝國相始終的御匾制度。同時，本文試圖解析包括大型視覺文物在中央與地方間，如何作視覺形式的轉換與時空的位移及傳播問題，與其廣佈可能牽涉的政治動力等課題。

關鍵詞：萬世師表、御匾、康熙、廣運之寶

前　言

臺南孔廟大成殿，高懸十三個御匾，以康熙的「萬世師表」年代最早，尺寸也最大（圖 2.1）。唯「萬世師表」御匾，不只見於臺灣，無論是當世或後世摹本，更廣泛分佈在中國各地孔廟，包括北京（圖 1.1）、山東闕里（圖 1.2）、江蘇江陰、浙江黃岩、廣東德慶、山西平遙、四川資中[1]等。它也如跨海到臺灣般，在越南孔廟出現，但卻沒有出現在日本的湯島聖堂，甚或韓國（圖 1.3）。

就已出版的、有限的、但也有定量例證的萬世師表匾額，根據其書寫格式及書風分析，證實書寫風格已格套化。其間雖仍存有各種細微差異，可能是不同時代的摹本，並存於世的關係。但無論如何，萬世師表御匾等，已形成與孔廟難以分割的文化意象。這種文化意象，雖有一定的分佈範圍，但時空廣佈的程度，不容忽視。由於山東闕里的原始初版「萬世師表」御匾，在文革時已遭破壞，[2]臺南孔廟如何以其珍貴的當世版本及其特有相關文獻資料，一方面反映臺灣歷史及文物史，另一方面也反映清初康熙皇帝如何史無前例地將其政治符號進駐孔廟神聖空間，並散佈各地孔廟，形成與大清帝國相始終的御匾制度。同時包括大型視覺文物在中央與地方間，如何作視覺形式的轉換與時空的位移及傳播問題，其廣佈更可能牽涉到背後政治動力等，本文試圖解析。

有關臺南孔廟文物的研究，涉及非移動性的文物如建築方面，[3]學界已累積一定的成果。唯對移動性的文物如皇帝御匾等，雖因臺南孔廟大成殿高掛康熙（1654-1722）至光緒（1875-1908）的八代清帝御匾，而享譽於世，不久前更因馬英九總統的贈匾格式及換匾現象問題，一度引起新聞界及觀光界的討論。[4]但有關臺南孔廟此移動性的文物，目前則仍罕見學界進行專論。

臺南孔廟御匾資料的作為例證，對臺灣及清帝國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珍貴性

---

1 陳傳平主編，《世界孔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卷一，頁 38、56、104、127、148、202、215。

2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東方出版社、天地圖書公司，1995），頁 160-161。

3 關於臺南孔廟建築等相關研究成果見於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畠怡三郎，1918）；傅朝卿、廖麗君，《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0）；廖麗君，《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研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之變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4 楊湘鈞，〈御匾學問大：拿下御匾毛毛的　想出新匾蓋舊匾〉，《聯合報》，2011 年 1 月 31 日，A5 版；楊湘鈞、李光儀，〈台南孔廟　馬匾連 3 錯　一放放 2 年〉，《聯合報》，2011 年 1 月 31 日，A5 版；〈馬錯贈「死人匾」被批「不尊孔」〉，《香港文匯報》，2011 年 2 月 1 日，A22 版。

與重要性。對臺灣而言，它們成為臺灣史及臺灣文物史上透視清領階段的視覺化的物質見證。臺南孔廟從康熙到光緒共計八代清帝御匾（圖 1.4），正與臺灣入清版圖的歷史進程相平行。臺灣從自古不通中國，到成為大清帝國版圖的第一年（康熙 23 年，1684）始，到臺灣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之前的光緒帝為止，即歷經清帝八朝轉換。至於清帝國北京國子監（即北京孔廟）目前仍保有的宣統御匾，則因臺灣當時已不再隸屬清帝國而闕如。更值得注意的是，此傳統，雖在臺灣因日治時期而中止。但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於 1945 年以後又復活此傳統。此傳統且隨著臺灣民選總統的歷任更迭，至今已累計歷任六個總統御匾（圖 1.5），更是世界孔廟中的獨特現象。

這種現今仍存活在臺灣孔廟的御匾傳統，事實上已成為臺灣文物史的重要現象，而此傳統的源起與隱含的原始文化意涵，康熙皇帝及其萬世師表御匾實啟其端。臺灣方志，不只透露出十三個御匾中最早的「萬世師表」御匾，此具體文物，如何初入臺灣孔廟與孔子牌位一齊被神聖化的場景、觀眾與幕後推手，更彰顯其何以成為地方官修志書以推廣儒學教化，以使「孤懸僻島」進入「一統文明」為職志中，成為重要的論述內容與政治目的。但是這只是「萬世師表」以御匾展示給「臺灣番民」的最終形式，促使御書跨海來台作空間移動及形式轉換的，有著來自海峽彼端的更直接的幕後推手、另一場景、及相關的人、事與物，為「臺灣番民」所未見，臺灣志書所未錄。其涉及康熙及清初御匾制度的形成與傳播問題，更彰顯大清政權在御匾與儒學相輔為用中，康熙皇帝作為女真族與「臺灣番民」同時被儒化的一面。

就視覺材料而言，「萬世師表」以書法形式表達，學界雖不一定一致的接受康熙是書法家，但基本上同意他一生好書法。有關康熙書法、[5] 碑刻的流傳及歷史考古的新發現，[6] 以及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7] 目前皆已部分分別公布出版，其書法風格也初步引起學界討論。[8]

就「萬世師表」御匾作為清帝國相關孔廟的文物而言，中國有些孔廟的「萬世

5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第 22 冊。

6 王麗娟、郭志雨，〈康熙書朱熹詩碑〉，河南省博物館主辦，《中原文物》，2010 年第 4 期，頁 111-112；楊子榮，〈康熙御書石刻〉，《文物世界》，2006 年第 1 期，頁 18-20；王曉林，〈聞喜縣博物館藏《康熙御書碑》〉，《文物世界》，2011 年第 2 期，頁 62-63。

7 相關奏摺見於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8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編委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5 期，頁 92-104。

師表」御匾，在文革期間已遭嚴重破壞。唯近年來部分孔廟又從文化遺產、觀光的角度，或經整修、或開始系統的調查或出版，[9] 目前雖只方興未艾，但也提供較多的參考標本，使本文不至於只就臺灣論臺灣。

就相關文獻方面，臺灣方志，除臺灣文獻叢刊及資料庫已收錄者外，1984 年，學界新發現的第一任臺灣知府蔣毓英（1684-1689 在任）《臺灣府志》，[10] 其記錄的時間，正與「萬世師表」御書時間相近，為本研究提供珍貴的當代訊息；中國方面文獻，臺灣商務印書館，已於 1983 年開始系統的出版文淵閣四庫全書，有關康熙朝的相關文獻及資料庫皆已問市。2009 年，臺灣聯經及中國中華書局，更分別將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清代康熙朝起居注公布，[11] 有關「萬世師表」御書年代前後資料，則包括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

本文合觀上述各方面資料，以試圖解析臺灣「萬世師表」御匾的書風、形式轉換與空間移動的文化與政治意涵，及其背後所反映的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及傳播問題。

一、臺灣府孔廟新文物的初現與神聖化：康熙御匾

臺南孔廟大成殿高懸的十三個御匾中，以康熙的萬世師表年代最早，尺寸也最大，與大成殿明間寬度幾乎一致，非殿中其它御匾可以匹敵。左邊八小字：康熙甲子孟冬敬書，前四字上鈐有一璽印，漢篆四字，為「廣運之寶」。意指書者為康熙皇帝，時間即為 23 年（1684）孟冬（圖 2.1、2.1.1）。

學界不一定一致的接受康熙皇帝是書法家，但基本上同意他一生好書法。不只臺灣故宮及北京故宮 [12] 仍保存康熙皇帝不同時間階段的楷書及行書，康熙皇帝且在

9 陳傳平主編，《世界孔廟》，卷 1，頁 38；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文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 74，彩圖 188。

10 （清）蔣毓英，陳碧笙注，《臺灣府志校注》（廈門：廈門大學，1985），前言，頁 1-5；（清）蔣毓英纂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6），卷六，頁 206-207。

11 清代康熙朝起居注請參考（清）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9）；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第 17 冊。

12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5 期，頁 92-104。

十六年（1677）在宮中特立南書房，[13] 將善書的社會精英網羅於朝中。根據現存文物考古、[14] 清文獻及其對子孫的庭訓格言中，[15] 顯示康熙好以書法贈人。如康熙好董其昌書法，南巡途中特於四十四年訪松江時，將特書的芝英雲氣匾額及前後書評贊等，命提督製匾懸於董家。[16] 因此，目前如山西聞喜、河南新鄉等仍存有與其相關的書蹟，經受賜者在當地刻石立碑，以示榮寵。[17]

臺灣何時出現康熙御書萬世師表御匾？其反映御匾在地方的傳播問題，值得關注。一般所接受的有關臺灣最早的府志，即康熙三十五年（1696）復刊的高拱乾（1691-1695 在任）《臺灣府志》，稱「府學，康熙二十三年，懸御書『萬世師表』龍扁於殿中」。康熙二十三年（1684），即與康熙書寫萬世師表同年，也是臺灣甫成為清帝國邊疆的一年。康熙皇帝在御匾上又自署「甲子孟冬」，即二十三年的十月。若依高說，則在康熙書寫的同年，在二三個月的短時間內，御書即已越海來到新領地臺灣？傳播速度豈如此之快？必須同時注意的是，高拱乾的二十三年懸於府學的說法，已為日後重要的臺灣府志的記錄所踵繼，[18] 儼然蔚為定說。

根據高拱乾稱，為臺灣府學殿中懸萬世師表御匾者，為臺厦道周昌及知府蔣毓英，且御匾等新文物的引入，為孔廟帶來新的形象，使得「廟貌煥然」。其事發的時間為康熙二十三年。但必須注意的是，根據高拱乾所提的，與御匾有關的兩位當事者的相關資料與說詞，卻與高說有所出入。

做為臺灣首任臺厦道周昌（康熙二十五至二十七在任，1686-1688），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曾在其「詳請開科考試文」的「公移」中，對臺灣府所繼承的明鄭孔廟，感嘆府縣學的「狹小之規模，草創之茅茨」，實不足以使甫成為清

13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趙爾巽等撰，《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本紀，卷六，頁 196；（清）清高宗敕撰，《欽定皇朝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2 冊，頁 19），卷二三。（以下簡稱《文淵閣四庫全書》）

14 王麗娟、郭志雨，〈康熙書朱熹詩碑〉，《中原文物》，2010 年第 4 期，頁 111-112；楊子榮，〈康熙御書石刻〉，《文物世界》，2006 年第 1 期，頁 18-20；王曉林，〈聞喜縣博物館藏《康熙御書碑》〉，《文物世界》，2011 年第 2 期，頁 62-63。

15 （清）清聖祖御製，《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頁 79。

16 （清）清聖祖御製，《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三集，卷八，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9 冊，頁 1-2。

17 王曉林，〈聞喜縣博物館藏《康熙御書碑》〉，《文物世界》，2011 年第 2 期，頁 62-63。

18 （清）范咸纂輯；陳偉智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重修臺灣府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5），卷二，頁 32；（清）劉良璧纂輯、楊永彬點校，《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5），卷首，頁 4。

帝國版圖的臺灣「肅海外之觀瞻，宏一統之文明」。他甚至於以「即御書匾額，亦無從懸豎」[19] 以況其狹小。不只說明御匾在御書寫成的兩年後，尚未旋掛於臺灣府縣學的實情；更說明此移動性的新的大型文物御匾，[20] 作為政治性的文物，在甫入版圖的地方官的心目中，已與府縣學所代表的詩書禮義的儒學教化結合成為有機體，成為使新地方進入帝國一統文明的重要新元素。唯此大型文物在傳播上進駐地方，反映地方是否能有相當場域以即時因應運作的問題。

周昌有關臺灣府縣孔廟規模及御匾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仍尚未現身於臺灣府孔廟的說法，也與首任臺灣知府蔣毓英相一致，而與高拱乾有所出入。蔣毓英《臺灣府志》可能因未在臺灣刊行，因此高拱乾撰府志時，自稱僅參考到其草稿。[21] 由於流傳不廣，至今僅存孤本於上海圖書館，1984 年始為學者所發現撰文介紹，成為比高拱乾更早的第一本《臺灣府志》。[22] 蔣毓英在該書記錄其任內的臺灣府學，「規模隘陋，彩繪不施，聖殿止有一間」，總結是「不過偽時草創，時非興朝郡學之觀瞻也」。至於臺灣、鳳山、諸羅三縣學，當時則皆未建。該書事實上更未提及「萬世師表」御匾了。[23] 也許書中未記，並不代表必然不存在，或許作者一時疏忽了？但作者卻記錄了康熙二十三年（1684）施琅因寧靖王故宅而建的天妃宮有御敕龍匾「輝煌海澨」。按該御匾目前仍存在該宮（圖 2.2、2.2.1），[24] 根據比對，御書時間及所鈐玉璽，與「萬世師表」近似。若當時臺灣府孔廟已有萬世師表御匾，作者該不致於顧彼而失此吧？

總之，我們比較接受的可能情境是，御匾書寫後的幾年間，在周昌及蔣毓英的任內，臺灣府孔廟可能仍未懸掛「萬世師表」御匾。但在十年後高拱乾任內所見者，則已高懸。高拱乾不無可能是誤將御匾上所書寫的時間認定為懸掛的時間。

---

19 （清）范咸纂輯、陳偉智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重修臺灣府志》，卷一〇，頁 297。

20 臺南文廟「萬世師表」御匾的確切尺寸為：長 477 公分，高 159 公分，厚 10 公分（感謝廟方方省雲先生提供）。根據其高懸於大成殿，與懸掛的明間寬度相當，而其它同在明間的御匾皆不及，以及其它懸掛在更窄的次間估算，此匾的尺寸實為殿中十三件御匾中之最。又北京孔廟之「萬世師表」御匾，長約為 6 公尺，寬約為 2.5 公尺，王琳琳、李永康，〈北京國子監〉，《中國文物報》，2008 年 7 月 30 日。若《中國文物報》的報導正確，則臺南與北京御匾的尺寸差異，則似乎說明御匾的大小，可能隨各地孔廟的空間作調整？

21 （清）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4）。

22 （清）蔣毓英，陳碧笙注，《臺灣府志校注》，前言，頁 1-5。

23 （清）蔣毓英纂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卷六，頁 206-207。

24 曾吉連編撰，《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1），頁 187。

分辨御匾書寫與懸掛時間可能不同的重要性，實因為二者時間的一致與差距的長短，事實上反映了御匾此大宗視覺形象，在清初清帝國版圖內，在中央與邊疆間的流動與傳播方法及速度等問題。檢視乾隆朝四庫全書所收錄的地方通志，「萬世師表」御匾，從御書書寫的康熙二十三年到二十八年（1684-1689）的五年不等的時間中，已遍佈清帝國。分別出現在包括自稱二十三年已有此御匾的山東、陝西、河南、四川、湖廣、江西、江南及廣東；[25] 二十四年已有的北京國子監、浙江及貴州；[26] 二十五年已有的廣西、山西與雲南；[27] 以及遲至二十八年始有的盛京孔廟。[28] 甚至在清帝國設郡立縣之外但為受封國的琉求，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受命為冊封琉球副使的徐葆光，已看到久米村聖廟懸有摹御書「萬世師表」四大字榜書。[29] 再者，至今越南河內孔廟仍以「萬世師表」御匾為其重要文物之一，而出現在國際觀光旅遊網站中。以上宣稱二十三年已有御匾的四川、湖廣諸廣大區域間，除山東為事發原生地外，其下達地方的命令是二十四年才發的，恐怕各方志所稱的時間記錄，也可能不乏是書寫時間與抵達時間未經分辨的結果吧？

臺灣府孔廟可能在康熙二十三年御匾寫成之際，也正逢臺灣的統治政權朝代轉換之時。且因當時清領因襲明鄭大成殿草創規模，無法在儒學神聖空間中，可以豎懸起新政權的新的具有政治意義的新文物，不無可能因此比上述的各地方略晚。但

---

25 （清）岳濬等監修，杜詔等編纂，《山東通志》，卷四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9 冊，頁 3；（清）沈青崖、劉於義等修，《陝西通志》，卷二八，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2 冊，頁 2；（清）田文鏡、王士俊等監修，孫灝、顧棟高等編纂，《河南通志》，卷四二，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6 冊，頁 3；（清）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四川通志》，卷五，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9 冊，頁 2-27；（清）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湖廣通志》，卷二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1 冊，頁 1；（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卷一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3 冊，頁 1；（清）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卷八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9 冊，頁 7；（清）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卷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2 冊，頁 27。

26 （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國子監志》，卷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0 冊，頁 8；（清）嵇曾筠、李衡等修，沈翼機、傅王露等纂，《浙江通志》，卷二五，《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9 冊，頁 6；（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等纂，《貴州通志》，卷九，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1 冊，頁 1。

27 （清）金鉷修，錢元昌、陸綸纂，《廣西通志》，卷三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6 冊，頁 4；（清）覺羅石麟修，儲大文纂，《山西通志》，卷三五，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3 冊，頁 2；（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纂，《雲南通志》，卷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9 冊，頁 5。

28 （清）和珅等奉敕撰，《大清一統志》，卷三五，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4 冊，頁 7；（清）阿桂、董誥修，劉謹之、程維岳纂，《欽定盛京通志》，卷四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2 冊，頁 3。

29 諸家著，《清代琉球紀錄集輯》，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第 292 種；（清）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306 種，頁 67。

可以較確切的認為在高拱乾成書的康熙三十五年之前，已出現在大成殿，成為地方官心目中的廟貌煥然景象。

這種新的大型的政治性文物，地方官及與儒學相關的地方士紳，是如何使其進入新領地的儒學神聖空間的？臺灣府學的清代相關的地方志，雖已無留下具體記錄，清代始建成的諸羅縣學與鳳山縣學則留下可貴的相關文獻，具體提供我們此代表著來自皇帝的文物，在新領地邊疆臺灣，如何成為孔廟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而與代表孔子及十哲先賢先儒的牌位一齊被神聖化。其所記錄的情境，已約在康熙皇帝書寫御匾的 20 年之後。

康熙丙戌（1706）在羅山西門外始新建成的諸羅縣學，仲冬，「萬世師表」御匾，在結綵亭、奏鼓樂中，與先師等牌位被「沿途具瞻，直至羅山」，迎入新宮，並選六日庚辰吉辰，「掛御匾於正殿」，而後縣令（宋永清）首奉先師牌位、次及四配，儒學教諭則奉東西十哲等，並行祭儀。圍觀的觀眾，則有臺灣「番民」。紀錄此「神聖盛況」的孫襄教諭，認為「番民觀者，莫不嘖嘖稱羨」。[30] 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因「諸羅乃海疆僻地」，宋永清縣令「概捐己俸，整修聖廟，次第完工，足見重道崇儒之盛心，紀功二次」。[31] 御匾的懸掛、孔廟的修建等視覺新形象的營造，載負著重道崇儒的價值觀，成為地方官的具體功蹟，記功的憑藉。具體說明傳播背後的操作群及政治官僚性。

鳳山縣學也有相近的文獻流傳。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鳳山縣學甫建成的十一月十八日，[32] 則由儒學教諭施士嶽率地方文武多士，不只迎先師孔子牌位入新宮，且在將摹勒的「萬世師表」御匾懸掛在大成殿時，儒學教諭與地方多士等，對未曾南巡臺灣的康熙帝，卻具體御匾已到來的物質代表，「望闕謝恩」。[33] 鳳山縣令則為文記錄盛事，並成為臺灣知府周元文收錄在《臺灣府志》的重要文獻之一。

我們雖無法求證於當時圍觀諸羅縣學迎神位與御匾的番民觀眾，是否真正的如諸羅教喻所描繪的「稱羨」，但清初皇權、儒學的神聖化，透過具體儀物，由地

30 （清）孫襄（諸羅教諭），〈諸羅學文廟記〉，（清）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府志》，卷一〇，頁 370-372。

31 曾吉連編撰，《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1），頁 187。

32 此時間，與康熙幸闕里以「萬世師表」御書為禮物的時間相同（詳下節）。是巧合或地方官有管道知道而有意安排？有待探索。唯《幸魯盛典》遲至康熙五十年始刊行（孔毓圻，《幸魯盛典》，頁 7），康熙幸魯的相關細節的公諸於世，時間則已在宋永清為諸羅及鳳山縣學之後。

33 （清）宋永清（鳳山令），〈鳳山文廟告成詳文〉，收入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一〇，頁 368。

方官僚與儒生合作，以孔廟作為公開展示與執行的場所，其所強調的價值觀，不只成為被紀錄的內容，且可能已在臺灣府縣的番民間散佈開來，以取代臺灣當地原有的。這種具體儀物，正隨著皇帝的更換，如滾雪球般的被再製造，這種儒學主流價值及神聖化，在臺灣的儒家化過程中，可能是持續進行的。因此，約一百七十年後，光緒五年（1879），在下淡水社的熟番部落，已不只是圍觀，且自組「孔子會」的記錄。其將「頊物莊公租粟四百八拾餘石，抽出壹百石交付殷實妥人經理收貯，放生立業；一為孔聖祀典饗祭之費，立功建業之源；二為社番子弟延師修業」，為的是讓「番童上進有階，文風日盛，萬代留存勿墜」。[34] 熟番部落以追隨儒家價值為上進的階梯，也就不足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諸羅及鳳山縣學的興建孔廟，懸掛御匾等儀物與儀式，鳳山縣令留有「記」，提供進一步的不在現場的更高層的官僚集團的贊成與報准。它們是從鳳山縣的直屬臺灣知府、到福建分巡臺厦道、到福建巡撫，福建臺灣海防總捕分府，所包括的官僚機構如下：

福建臺灣府知府
福建分巡臺厦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福建臺灣海防總捕分府
福建分巡臺厦道兼理學政按察使司副使
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院藩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
提督福建等處學政詹事府左春坊左贊善
護理福建巡撫印務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院
共計七個相關支持單位。[35]

顯然，康熙御匾此新文物，在以臺灣府孔廟為場域下，圍觀的番民與執行的臺灣縣令、教諭及地方儒生的在場之外，是經過不在場的直屬的海峽彼岸的福建省的核准與贊成。它們在此大型文物的跨海來臺的過程與方式上，扮演其中央到地方的轉承及贊助的角色，得到具體的證明。事實上，這種轉承，是承自更高層的中央的。換言之，促使御書跨海來臺而與孔廟為主要展示場地者，提議者、決定者、執行者及御書的相關格式者，更涉及另一批第一時間及場景中的人、事、物。包括親見「萬世師表」御書最早展現版的衍聖公孔毓圻（1657-1723），他為孔子六十七代孫，其

34 《臺灣私法人事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頁 276-277。
35 （清）宋永清，〈諸羅文廟告成詳文〉，收入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一〇，頁 373；（清）宋永清（鳳山令），〈鳳山文廟告成詳文〉，收入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卷一〇，頁 368。

《幸魯盛典》[36] 保留有寶貴的相關記錄。主導者康熙皇帝，其〈南巡筆記〉、[37] 旁觀的臣下目擊者所記錄的《康熙起居注》、[38] 及其它皇家等相關記錄互為參證，提供重要、且較詳盡而具體的線索，讓我們在試圖重建第一場景中，探討其原始意涵，並比較更換場景後的衍生意義。

二、「萬世師表」御書進駐曲阜大成殿：康熙幸闕里的禮物之一

根據《幸魯盛典》，可知「萬世師表」以御匾形式出現在臺灣府縣學，並不是御書第一次公開展示的形式。御書第一次公開展示的形式，不是「匾額」，而是「卷軸」。其由康熙親自在山東闕里大成殿，親命侍衛捧出，展示在孔毓圻等孔氏子孫之前，時間為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就在此日，康熙皇帝親幸闕里。幸闕里，雖只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南巡中的一站，康熙皇帝此舉，卻是大清政權中的第一位，不只在異族統治大多數漢人的政權中，是罕見的，[39] 就連歷代皇帝中親幸闕里者，也屈指可數。[40]

「萬世師表」御書，即是康熙皇帝選作首幸闕里的兩件視覺文物作為禮物中的一件。比起另一件「屈柄黃蓋」，只經空間轉換，由宮中進入闕里，從皇帝的儀物，成為闕里的祭孔儀物，在進行祭儀時始出現。康熙御書，從御書所書「孟冬」推論，是在拜訪的一個多月前，已預先寫成，形式及地點，皆經考慮選定。在形式上，並不是康熙皇帝一行人所帶來的利於收捲攜帶的「卷軸」。這種形式，或許只是為了攜帶到闕里的方便而已。因此，康熙在展示卷軸形式的同時，已指稱終極所要的是「懸額」，即是必須是懸掛的「匾額」。若從文物置放的場所看，「匾額」似乎是比「卷軸」更具有懸掛場所的不易更動性；至於懸掛的地點，則指定他正展示給孔氏後代時所站立的「大成殿中」。[41] 康熙皇帝成為第一位將皇帝個人書法移入

36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2 冊。

37 （清）清聖祖，〈南巡筆記〉，《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二〇，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8 冊，頁 3-8。

38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7 冊，頁 B008460-B008466。

39 滕紹箴，〈論東北興起的幾個民族政權的中原文化認同——談祭孔問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11 年第 1 期，頁 1-9。

40 根據孔毓圻考證所例舉者如漢高祖、光武帝、章帝、後周太祖及宋真宗等，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二，頁 28；卷三，頁 5、13、14；卷五，頁 17；卷七，頁 13。雖不是沒有，但仍相對罕見。

41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七，頁 12。

孔廟大成殿的神聖空間者。

歷代皇帝如宋徽宗者，也曾為闕里御書御匾，但只寫大成殿殿名，懸在殿門口；[42]「萬世師表」御匾，則透過皇帝的指示，高懸於大成殿中。此懸掛地點的醒目聚焦性，其在神聖空間中進駐政治性的視覺文物，與大成殿中的神像與牌位並存，更是史上所未曾有的。此皇帝親自送來的禮物，其載負的背後意涵，皇帝更在殿中已明確宣示：

> 至聖之德，與天地日月同其高明，廣大無可指稱，
> 朕向來研求經義，體思至道，欲加贊頌，莫能名言。
> 特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殿中，非云闡揚
> 聖教，亦以垂示將來。[43]

此大清皇帝，研讀漢知識份子所敬仰的至聖先師經義，並親自以漢知識份子人文素養的書法形式，書寫「萬世師表」，送達大成殿。不只表達女真皇帝對孔子的贊頌於當下，「懸額殿中」的提出與堅持，正可能因為可將「萬世師表」此象徵康熙皇帝與儒家的關係，進入大成殿的神聖空間中，與孔子牌位及神像所代表的漢族崇儒的長遠傳統相結合，而使「當下」，躍升到具有「將來性」，也就是康熙當場所說的「垂示將來」。康熙為其新的視覺文物，以其帝王之尊，在漢人史上已建立的深遠傳統的祭孔神聖空間中，為御書選出此可能不朽的場所。

唯此具有政治性意涵的新文物，事實上，不僅只限於入駐闕里大成殿，更及於清帝國及附屬國孔廟。縱使到現代，我們仍看到目前臺灣府學的「萬世師表」御匾，保留著高懸於大成殿的傳統；山東闕里孔廟亦然，[44] 它們皆反映著康熙的原始意圖；相對的，北京孔廟者，則在民國初年（1917），黎元洪以北洋政府大總統身分為名的匾額入駐大成殿，取代「萬世師表」御匾原位，後者則遭移出大成殿外至今；[45] 至於四川德陽孔廟，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調查圖式推測，「萬世師表」御匾顯示被高懸於大成殿迴廊，[46] 似乎非「殿中」。從目前北京與四川德陽所懸掛御匾等例證，顯然與康熙初衷，已有所距離。但無論懸掛何處，御匾遍及各地，已是

---

42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七，頁 15。

43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七，頁 12。孔尚任，〈出山異數記〉，《昭代叢書》，卷一八，頁 11。（缺出版項、未放在引用書目）

44 陳傳平主編，《世界孔廟》，卷 1，頁 38。

45 王琳琳、李永康，〈北京國子監〉，《中國文物報》，2008 年 7 月 30 日；陳傳平主編，《世界孔廟》，卷一，頁 56-57。

46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文廟》，頁 74，彩圖 188。

歷史事實。

必須進一步注意的是，促使御匾從闕里遍及清帝國者，則為隨行康熙皇帝至闕里的較年長[47]的漢人近臣[48]張可前。他為年剛過三十的康熙皇帝闡述，如何利用清帝國孔廟網絡複製與傳播文物的重要性，展現漢知識分子如何協助年輕大清皇帝，以儒學等相關因素及書法形式治理清帝國的案例。他「奏摺」中的提議，在康熙朝中，短時間內，很有效益的變成「詔書」的內容。

三、御匾從闕里到清帝國：概念的提出者——張可前

事實上，關係「萬世師表」御匾在臺灣府等地終究遍於清帝國者，是出自康熙皇帝的原始意圖？他對其御書，除僅止於「懸額（闕里大成）殿中」的原始意圖外，是否也意圖擴及於清帝國？根據孔毓圻的記錄，此懸掛地點的擴大，關鍵人物則指向左副都御史張可前。其想法提出的時間，是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49]他的奏摺快速而成功地成為詔書的內容，並下令執行，是在該年二月。御書的由僅止於闕里，到普及於大清帝國，從事發到下令執行，為期約三個月。足以顯現其重要性及其與康熙朝行政力量與效率的關係，值得關注。

張可前奏摺提出的時間，起居注官鄔黑、儲振則提供更精確的時辰，「二十七日丁亥辰時」。[50]距離康熙幸闕里以御書為禮物的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雖只兩個多月，但已是新的一年。鄔黑於康熙二十二年四月，曾以翰林院侍讀祭安南故王，[51]且於二十三年四月以翰林院侍講學士任《日講易經解義》校閱官；[52]同二十三

47 目前雖無法從殘存的資料建立張可前的生卒年，但從其順治 9 年（1652），即在康熙帝（1654-1772）出生前兩年，已第進士。（清）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湖廣通志》，卷三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2 冊，頁 2。推論，張可前在康熙親幸闕里送御書「萬世師表」之際的 23 年（1684），可能已年過 50 歲。

48 張可前不只在康熙二十一年一月十四日受邀參與皇帝的昇平宴，且同群臣賦詩（清聖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卷三五，頁 8）；康熙二十三年隨行皇帝親幸闕里並和詩（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二二，頁 5）；康熙二十四年二月九日，康熙且在張可前上奏的近期內，贊其「才具果優」，陞補刑部侍郎；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7 冊，頁 B008666。

49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一三，頁 1。

50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7 冊，頁 B008460- B008466。

51 （清）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皇朝文獻通考》，卷二九六，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38 冊，頁 15。

52 （清）牛鈕、孫在豐，〈官銜〉，《日講易經解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 冊，頁 2。

年，儲振亦任皇朝日講起居注官。[53] 唯二者在為康熙記錄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起居注張可前條奏時，只錄條奏的兩項中的前項，即將皇上歷年聽政，彙集成書刊刻，昭示臣民。[54] 所幸孔毓圻詳錄兩項中的另外一項，透露此年長的漢人近臣，建議年輕皇帝如何利用帝國各地孔廟網絡，將「萬事師表」御匾，從闕里推廣到各地士民面前。張可前向皇帝提到，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額孔廟，固為「曠典盛事，振古所無」，但須更進一步，「請敕部勒石，徧頒各省學宮」。唯有如此，始可收到以視覺文物載負政治意涵，展示在士民之前的效果。所謂「不獨尊師重道之盛德，昭示士類，更見龍飛鳳翥之寶篆，光垂寰區也」。[55] 果然，康熙皇帝在短時間內，康熙二十四年二月間，即下詔：

> 以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摹搨，頒天下文廟。[56]

張可前的提議，使得只侷限在闕里的御書視覺文物，透過摹搨方式，在各地學宮的網絡中，遍及天下士子之前。而免於一如其條奏前項所言，起居注等文獻，雖已詳記聖績，但只藏諸金匱石室，人間無由窺測。至於奉詔所修的方畧，只重武功而忽視仁德，不一定會記錄。「萬世師表」御匾，終得以不只進入闕里大成殿的神聖空間的方式，更在空間上遍佈清帝國各地孔廟大成殿，呈現在各地士子的學宮及春秋祭孔祭儀中。就在同年，二月九日，張可前得到皇上贊詞，並陞官，起居注只記結果，「張可前才具果優，著陞補刑部侍郎」，似未記其因，[57] 其陞遷的時間與此事如此接近，推測或許與此奏的成功不無關係。

四、御書「萬世師表」傳播的具體方式、管道與摹本問題

御書「萬世師表」四字，康熙只親自書寫一次，而留在闕里，其書法，如何被複製，裝裱，而以御匾的形式遍及清帝國？就物質層面論，就個別單字本身，長寬各一米，作成御匾，可算是大宗文物，其是以御匾本身？或其它的方式？且如何作廣大的空間流動？孔毓圻的記錄，為傳播的具體方式、管道與摹本問題，提供部份線索。

---

53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撰，《詞林典故》，卷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9 冊，頁 50。

54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8 冊，頁 B008641-B008642。

55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一三，頁 4。

56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一三，頁 1。

57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第 18 冊，頁 B008666。

康熙下詔書，令州縣孔廟懸掛而後，「萬世師表」御書所作的空間流轉，是隨著闕里與帝國中不同層級的官方的轉換所合作推動，御書的形式也隨之變化，產生原本與摹本的分化問題。這些推動御書作空間流轉的人為政治動力，為後世所廣為流傳的多元版本，提供理解的新角度。

「萬世師表」御書的原版，是以「卷軸」的形式，由康熙展示給孔毓圻的。孔毓圻則將其製匾，懸設闕里大成殿。[58] 第一版御書形式，因此由「卷軸」成為「匾額」；地點則由「宮中」進入「闕里」。唯此第一版，則在文革期間已遭破壞，僅存舊照片傳世。因此，原版目前已消失。

但「萬世師表」原版，在成為「匾額」的同時，孔毓圻雖已謹慎「選工石」，請刻工摹刻立碑。由於已非原版，孔毓圻經摹搨、裝裱成「卷軸」、再進呈康熙皇帝時，已表達因臨摹而不免失真的憂慮。[59] 文獻資料並沒有顯示，康熙對此摹本曾表達不滿，或許它不是康熙不滿意的摹本吧？

文獻再告訴我們，孔毓圻且在闕里立碑。根據 2000 年所公佈的有關曲阜闕里孔廟的文物中，即有被稱為「康熙皇帝手書石刻萬世師表」圖示，目前被崁在聖蹟殿中發表，[60] 其重要性及可靠度，後文將再部分論及。但可以確定的是，此闕里摹刻立碑，事實上，成為傳播到各地御匾的典範來源。決定此傳播方式，是有促其成功的相關單位配合的，而其層級，正指出由中央到地方的暢通管道，事實上是由闕里負責承擔中央到地方的轉播站。即中央的內閣九卿詹事科道奉旨「以御書萬世師表匾額摹搨頒天下文廟」旨下，再由「禮部」勑下該撫，在闕里印刷，再由「禮部」頒發各省「巡撫」，再轉行各「州縣學宮」懸置匾額。[61] 透過闕里的轉承，在省「巡撫」這一級，我們找到「萬世師表」御匾如何由康熙手中至各地士民面前的轉接點。在始入駐臺灣縣學儀式時，所要上呈的最高層級是「巡撫」；而「巡撫」，也正是由康熙皇帝手中至闕里、至禮部、再到「州縣學宮」的前一站。我們似乎看到，康熙「萬世師表」御書的形象，正透過上述層層政治機構的密切接力合作，形成環環相扣的網絡，而作空間的流動。

我們想進一步探索的是，在此層層政治機構聯手作視覺形象的空間流轉中，其

58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一三，頁 9。

59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一三，頁 10。

60 孔子故里編輯委員會主編，《孔子故里：東方智慧的文化殿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頁 74-75。

61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卷一三，頁 8。

如何被複製？它又以何種形式作位移？官方文獻，對主導位移的政治機構提供較多的線索，但只侷限從康熙皇帝手中到闕里、到禮部的形式轉換而已，即「卷軸」到「立碑」的摹搨轉換。至於如何由禮部到各地方？透過臺南孔廟等現存文物及相關地方志等資料，進行比對與分析，或可提供部分蠡測的線索。

特別是摹本問題，由於康熙皇帝留在闕里的第一版原版，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破壞，但有未遭破壞前的舊照片[62]及正遭破壞時的照片（圖 3.1）[63]留傳，並公佈有康熙皇帝簽名且鈐印的「萬世師表」石刻（圖 3.2）。本節將以保存完整的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64]為中心，參證北京國子監（圖 3.3）者，[65]會觀闕里舊照片及石刻，參考康熙相關書蹟，分別就書法本身、書法間架與框架的格式關係、以及璽印風格論之。

就「萬世師表」四字的書法本身言，比對臺灣府孔廟的、北京國子監的現存「萬世師表」御匾的書法風格[66]及闕里 1942 年舊照片及石刻，從字的間架及書寫的特徵，似乎有同出一稿的可能性。如：「世」字三豎筆之中間一筆，特別高出；「表」字第三橫都露鋒，下筆幾乎一致。但是，「萬」字草頭，左右橫筆，並未相連，顯示臺灣府孔廟者與闕里傳統的相似度，而與北京國子監者的左右橫筆相聯，有明顯的不同。同時，「萬」字下半部的上鉤部分，與最後收筆的一點，並不相連，此字體筆畫間的結體與習慣，也顯示臺灣府孔廟與闕里的相近性，而與北京國子監的相連的結體有別（圖 3.4）。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與闕里同時具有的「萬」字結體特點，亦出現在康熙皇帝的硃批中，[67]並見於其「暢春園記」楷書。[68]這種現象似乎顯示，臺灣府孔廟與北京國子監者，雖同是以源於闕里所傳的拓本為典範，但可能在拓本傳至各地時、須由各地敦請木工師傅將拓本轉換成木刻，再成御匾形式形時，可能形成差異現象。這些差異，可能更廣泛的包括字體的臨摹、簽名、甚

62 見「照片中國　高清晰老照片」網站 www.picturechina.com.cn（檢索日期：2013 年 3 月 30 日）。

63 朱華，〈【歷史秘聞】揭秘搗毀孔府的紅衛兵女頭領譚厚蘭〉（club.China.com）；楊克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上冊，頁 160-161。

64 臺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懸掛的大成殿明間，由於另懸掛有其它兩個御匾而部分被擋，因此，完整的圖示需參考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編印，《大成至聖先師孔子 2534 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 150 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頁 13。

65 感謝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許雅惠提供現場拍攝照片。

66 感謝王耀庭先生提供有關書法風格方面的意見。

6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3），第 4 冊，頁 720。

68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8 冊，頁 96。

至是主體書法之上下左右的木框裝飾形式等等。

如北京國子監版本的「萬」字，其所座落的部位，與御匾的木框裝飾間距，相當緊迫接近。相對的，臺灣孔廟者，則與闕里御匾正遭毀壞所拍攝的照片，皆共同顯示「萬」字與裝飾木框有相當的間距。再者，就木框裝飾的形式而言，北京國子監的御匾木框，邊飾作波浪狀；臺灣孔廟者則與闕里者，同顯直線所形成的長方形。總之，根據以上四點細微差異的具體比較，似乎可以推論，臺灣孔廟的版本，顯然比北京國子監者，更反映闕里摹刻康熙親自交與闕里裝裱成卷軸版本的原樣。

事實上，臺灣孔廟與北京國子監者的細微差異，不只「萬世師表」御匾的主體書體四字、木框的裝飾形式，更及於更細微的璽印的書體等。可惜闕里御匾目前的殘留影像，已無法提供有關璽印此細緻清晰的比對樣本了。但現存的相關的其它璽印的視覺證據，仍提供參證，協助釋放更多的訊息，以說明摹本問題及所牽涉的其它文化議題。

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在康熙皇帝簽字的一行八字的前四字上鈐有一璽印（圖 3.5），部位在「康」字的下半部及略重疊在「子」字的第一筆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上的文字，是「漢文篆書」與「滿文楷體」各一半。漢篆四字，為「廣運之寶」；滿文部份，計七字（圖 3.6）。可能因年代久遠？或因臨摹者不熟悉或不識滿文而依樣畫葫蘆？字裡行間多處筆畫呈現中斷，尤其與漢篆相鄰的一行四字中的第一、二、四、字。此外，另一行三字的第一及第三字，該上鉤的字母，則鉤體已不見。因此，造成辨識的困難，甚或易誤認其偽。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皇帝曾整理考訂清宮御璽 25 方，交交泰殿貯存，[69] 此乾隆欽定「二十五寶」的圖式，在 2005 年已經由中國故宮博物院公佈，[70] 其中即有一方「廣運之寶」印璽（圖 3.7），尺寸為長 19.65 公分、寬 18.5 公分，為二十五寶中最大者。值得注意的是，與臺灣孔廟萬世師表御璽的尺寸幾乎一致，後者為長 19.65 公分、寬 18.5 公分。同時，漢篆的文字、詞彙、篆法、構形及結體幾乎相近。但是必須更進一步注意的是，兩方璽印滿文的部份，從構形到篆法等，卻有相當大的差異。難道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上御璽因有不易辨識的清文部分，及其與二十五寶中之大小相近的一寶的不同，因而有可能成為懷疑其真偽的理由？所

69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〇四，頁 3065。
70 鄭珉中主編，《故宮院藏文物珍品全集．23．璽印》（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頁 209。

幸，參照北京國子監御匾上的局部璽印圖式（圖 3.8）、[71]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上璽印拓本（圖 3.9）[72] 及臺南大天后宮「輝煌海澨」御匾上璽印（圖 3.10），[73] 四方璽印的滿文及漢文 [74] 字體字型及結構，基本相近。[75] 不只不易辨識的滿文的部分，筆畫得以因相互對照得以補足，更可識出其滿文的部份，乃為康熙時對「廣運之寶」的意譯方法及清文的楷寫方式。其雖與乾隆二十五寶「廣運之寶」的翻譯詞彙及滿篆篆法不同，卻保留了乾隆十三年（1748）滿篆改革前因改革而幾乎消失的具體的視覺演變軌跡，其復原的滿文羅馬拼音及譯注為：左邊第一行為三字，onco（寬廣的）goro（遠）jecen（疆界）；左邊第二行為四字，aku（無）yabun（行，行為，行走）I（的）boobai（寶貝），[76] 約可粗疏的直譯為「寬遠無疆之行之寶」；相對的，乾隆二十五寶的「廣運之寶」璽印的滿文羅馬拼音、譯注：左邊第一行：三字為 forgon（運）be（把）badarambure（使開廣的）；左邊第二行一字：boobai（寶貝）；直譯為：「把運勢開廣的寶貝」。[77] 顯然，乾隆在滿漢對譯的方法上，是將康熙的以滿文字數七字，較為繁複的意譯漢文四字的基礎上，找到了與漢文四字可以相對應的滿文四字；並改變了康熙的滿文楷體的書寫方式，發明出他心目中以為可以與漢篆相對應的「清篆」。康熙「廣運之寶」與乾隆二十五寶「廣運之寶」的漢文與尺寸的相近性，以及滿文

71 唯該印被誤以為是「康熙御筆之寶」，王琳琳、李永康，〈北京國子監〉，《中國文物報》，2008 年 7 月 30 日。

72 傅斯年圖書館拓片室，館藏編號 T638.1 3513。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清史圖典》，收入《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第 66 冊，頁 58。感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林士炫提供資料。又根據文獻，該碑於康熙 37 年 10 月頒布於直省學宮《皇朝通典》，卷四八，頁 34。

73 唯該印被誤以為是「康熙御筆之寶」，曾吉連，《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頁 187。

74 唯「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璽印「廣」字的「黃」上半部兩點與其它三方璽印略異。此方璽印較臺灣府孔廟者小，不及一半，僅寬 8.6 公分、高 8.2 公分。此方印璽分別被鈐在滿（長 222 公分、寬 77 公分）漢（長 206 公分、寬 75 公分）對應的碑文上方各一方，以及滿漢文銜接處一方，璽印的漢篆部分在漢文碑上，滿楷璽印的部分，則在滿文碑上。該碑銘記書寫時間為「康熙四十三年（1704）三月二十一日」，推測此印璽可能使用在比「萬世師表」大印璽晚約 20 年，唯二方璽印大小不同，漢文寫法略異，書風則基本上相近度甚高。

75 雖然「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璽印的滿文字尾勾寫，屬一般楷字寫法，與其它三方璽印的滿文字尾豎寫的較有古風略異（感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林士炫提供意見），但與乾隆皇帝的廣運之寶璽印滿文寫法相比，四方康熙皇帝璽印仍是相近的。

76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朝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頁 584、192、1101、1329、1383、31。

77 本文有關滿文的部份，感謝林士炫、莊吉發二位先生提供寶貴的滿文的專業意見。

的相異性，正成為文獻[78]所記錄的乾隆十三年（1748）滿文篆法的改革[79]及其在國家璽印的運用[80]的具體例證。

根據文獻，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對滿文及皇家璽印的大改革中，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所累積，再經乾隆十一年（1746）選擇的二十五方國寶中，只有四方保留漢文篆體，滿文本字外，其餘二十一寶的滿文本字，皆一律改鐫清文篆體。[81]乾隆二十五寶之一的「廣運之寶」的使用清篆，「萬世師表」上的使用滿文本字，及漢文與尺寸的相近性，皆反映了乾隆滿文篆法改革的前後現象。換言之，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上的「廣運之寶」御璽，事實上，很可能即是被乾隆改革的二十一寶之一，而在乾隆改制的二十五寶中，成為乾隆所主導的滿文與御璽改革的歷史浪潮下的滄海遺珠，卻在臺灣府孔廟中有幸被保存下來。它不只見證了此乾隆皇帝清篆改革前之具體的書寫視覺形象，更說明了此改革的內涵，包括具體落實在滿漢文的翻譯上，從康熙時的較多字的意譯，轉變成更簡潔的、字數也可相對應的直譯。[82]

當然，我們必得承認，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上「廣運之寶」璽印的滿文字形與北京國子監者，仍有其細微差異，但不是字體結構的，而是字形的。如左邊第一行第三字「無」字，與較完整朔漠碑者相比，臺灣府者及北京者的最後一筆，皆已不見；至於「無」字右邊的兩點，臺灣府者尚存，北京者則已不存。我們僅簡選此兩處細微差異以代表更多類似的例證，以為它們如同二匾的尺寸差異一般，參照前文所提供的更基本的文字結構等的相近下，共同說明，此細微差異，很可能因相近摹本經不同區域的再臨摹與再複製所形成的差異的結果。從康熙留在闕里的第一版、到闕里臨摹立碑的第二版、到拓碑形成典範的第三版、到地方再複製典範裝

78 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六三，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0 冊，頁 56。

79 根據佟永功的研究，乾隆在位期間對滿文及與漢文對譯的問題多所規定。佟永功，〈乾隆皇帝規範滿文〉，收入氏著，《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沈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頁 41-57。

80 郭福祥，《清代帝后璽印譜》，前言，頁 4-5。

81 「國家寶璽，朕依次排定，其數考二十有五，向兼清漢文，漢文皆用篆體，清文有專用篆體者，亦有即用本字者。今國書經朕指授篆法，宜用之於國寶，內有青玉『皇帝之寶』，本系清字篆文，乃太宗時所貽，自是以上四寶，均先代相承，傳為世守者，不宜輕易。其檀香『皇帝之寶』以下二十一寶，則朝儀綸渤？所常用者，宜從新定，清文篆體，一律改鐫」。清高宗，《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六三，頁 56。

82 根據佟永功研究，乾隆在位 60 年間，為規範滿文下達的上諭不少於 110 次，經他欽定後頒佈施行，被稱為「欽定新清語」，據不完全統計 1600 多個詞條，涉及滿語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佟永功，〈乾隆皇帝規範滿文〉，《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頁 41。

飾成匾額的形式已是第四版了。因此，在臺灣府孔廟及北京國子監所見的「萬世師表」御匾，雖數度經輾轉複製，以及不同地方木工刻工等的互異，有自然流露的細微差異，亦有掩飾不了其來自相同典範的更明顯的共通性。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上的滿漢「廣運之寶」御璽與臺南大天后宮御匾御璽使用的時間及滿漢文作風皆近；「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璽印則時間晚約 20 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璽印的滿文字尾勾寫，屬一般楷字寫法，與其它三方璽印的滿文字尾豎寫的較有古風略異，[83] 尺寸則較小，但與乾隆皇帝的廣運之寶璽印滿文寫法相比，四方康熙皇帝璽印的譯法及書寫格式仍是相近的。可能在康熙年間，用在皇帝對各地的公開文告、碑文或與匾中。乾隆年間總結其前之清廷御璽成二十五寶，並稱「廣運之寶，以謹封識」，[84] 反映歷史實情。

餘　　論

臺灣府孔廟大成殿在康熙年間懸掛康熙御書「萬世師表」御匾後，陸續懸掛有雍正御筆的「生民未有」及乾隆御筆的「與天地參」至光緒御筆的「斯文在茲」，計八方御匾，在兩百多年清帝國的帝王更迭間，未曾有一代帝王御匾或有間斷，而未曾下達到帝國邊陲的臺灣府學。換言之，自從康熙二十三年以御書「萬世師表」作為首次親幸曲阜闕里的禮物，而命闕里將唯一的原版裝框成御匾，懸掛於大成殿以來，此御書御匾形象，已透過闕里作為此書法形象的轉運站及立碑轉拓的形象複製的中心，經由層層的轉手或再複製，包括闕里到禮部、到巡撫、到州縣學等。而將此形象、由皇帝手中的禮物，搖身一變，而成為清帝國各地士子上學祭孔時必然進入視野的形象。形象雖經數度複製，各地不免有所細微差異，但其具體化了女真皇帝康熙與漢人儒學的親密關係，則一也。此典範的成立與傳播，在清廷、闕里與地方間建立起層層綿密網絡，當各地的視覺史料或已在文革中消失之際，臺灣府孔廟保留了可貴的視覺及地方志證據，成為我們繫聯消逝的歷史情境之重要環節。

康熙皇帝在清帝國各地孔廟將具有政治意涵的御匾或符號，並不是在皇帝即位之年，而是在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進入曲阜大成殿的儒學的神聖空間中，在歷史上是鑿空的，為此後清帝國的歷朝皇帝及各地孔廟的視覺形象，樹立了不絕如縷

83 感謝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林士炫提供意見。

84 楊家駱主編，楊校標點本，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一〇四，頁 3067。

的典範。只是制度一經確立，皇帝親幸闕里以御書作為禮物的一幕，也不再成為必須再複製的必然歷程，由中央國子監直接及於地方各州縣，闕里亦包括其中。雍正不在其即位之年，而在三年（1723），頒發國子監，[85]《山東通志》雖記錄四年「御題生民未有匾額於聖廟大成殿，頒發直省府州衛儒學恭摹製造」，但雍正二年（1724）闕里聖廟的大火，皇帝關心，但並未親幸。整修直至八年始告成，「萬世師表」御匾一如康熙所願，懸於「殿內天花枋上」，相對的，御書「生民未有」匾額則安於「殿外門枋上」，[86] 或許雍正御書行於州縣孔廟，只是康熙皇帝已建立的御匾制度的再複制而已，顯然並未堅持其御匾必然在殿中。雍正皇帝與儒家關係，在孔廟的視覺展示，另有其新形式及新內涵。但無論如何，清帝賜御匾於各地孔廟的制度已儼然確立，並在今日民主臺灣的臺南孔廟，仍不絕如縷，已 300 年以上，並在大成殿蔚為不可分割的政教揉和的視覺奇觀，展現民主臺灣對於歷史記憶的珍惜與和平共存的保守傳統的一面，成為臺灣文物發展史的重要內涵。

〔後記〕謹以此文獻給業師孔教授達生、Prof. William Watson、Prof. Roderick Whitfield。

85 （清）梁國治，《欽定國子監志》，卷九，頁 8。
86 （清）岳濬等修；杜詔等纂，《山東通志》，卷一一之四，清乾隆元年（1736）刊本，頁 65-66。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孔毓圻，《幸魯盛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牛鈕、孫在豐，《日講易經解義》，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田文鏡、王士俊等監修，孫灝、顧棟高等編纂，《河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沈青崖、劉於義等修，《陝西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66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清）和珅等奉敕撰，《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岳濬等監修，杜詔等編纂，《山東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金　修，錢元昌、陸綸纂，《廣西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阿桂、董誥修，劉謹之、程維岳纂，《欽定盛京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范咸纂輯；陳偉智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重修臺灣府志》，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5。

（清）庫勒納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據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手稿本影印。

（清）徐葆光撰，《中山傳信錄》，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30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

（清）郝玉麟等監修，魯曾煜等編纂，《廣東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高拱乾纂輯、周元文增修、張光前點校，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4。

（清）梁國治等奉敕撰，《欽定國子監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大清會典則例》，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清高宗敕撰，《欽定皇朝通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4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清聖祖御製，《聖祖仁皇帝庭訓格言》，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1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清聖祖御製，《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嵇曾筠、李衡等修，沈翼機、傅王露等纂，《浙江通志》，第 519-52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撰，《詞林典故》，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等纂，《貴州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1-57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鄂爾泰等修，靖道謨纂，《雲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黃廷桂等監修，張晉生等編纂，《四川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愛新覺羅（弘曆）清高宗，《皇朝文獻通考》，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3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趙弘恩等監修，黃之雋等編纂，《江南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0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趙爾巽等撰，楊家駱校，《楊校標點本清史稿》，臺北：鼎文，1981。

（清）劉良璧纂輯、楊永彬點校，《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收入《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5。

（清）蔣毓英，陳碧笙注，《臺灣府志校注》，廈門：廈門大學，1985。

（清）蔣毓英纂修，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方志彙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6。

（清）諸家著，《清代琉球紀錄集輯》，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文獻叢刊》，第 29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清）謝旻等修，陶成等纂，《江西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邁柱等監修，夏力恕等編纂，《湖廣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覺羅石麟修，儲大文纂，《山西通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4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二、近人著作

孔子故里編輯委員會主編，《孔子故里：東方智慧的文化殿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山田孝使，《臺南聖廟考》，臺南：高畠怡三郎，1918。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22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 8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 4 冊，北京：檔案出版社，1983。

王曉林，〈聞喜縣博物館藏《康熙御書碑》〉，《文物世界》，2011 年第 2 期，頁 62-63。

王麗娟、郭志雨，〈康熙書朱熹詩碑〉，《中原文物》，2010 年第 4 期，頁 111-1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文廟》，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清史圖典》，收入《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66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安雙成主編，《滿漢大辭典》，朝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

佟永功，〈乾隆皇帝規範滿文〉，收入氏著，《滿語文與滿文檔案研究》，沈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北京：檔案出版社，1985。

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帝后璽印譜》，北京：紫禁城，2005。

陳傳平主編，《世界孔廟》，卷 1，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傅朝卿、廖麗君，《全臺首學臺南市孔子廟》，臺南：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出版社，2000。

曾吉連編撰，《祀典臺南大天后宮志》，臺南：祀典臺南大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1。

楊子榮，〈康熙御書石刻〉，《文物世界》，2006 年第 1 期。

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編委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 年第 5 期，頁 92-104。

楊克林編著，《文化大革命博物館》，香港：東方出版社、天地圖書公司，1995。

廖麗君，《臺灣孔子廟建築之研究——廟學制的影響及廟學關係之變遷》，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編印，《大成至聖先師孔子 2534 週年誕辰釋奠暨以成書院 150 週年特刊》，臺南：臺南市文廟管理委員會，1984。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私法人事編》，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17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滕紹箴，〈論東北興起的幾個民族政權的中原文化認同——談祭孔問題〉，《承德民族師專學報》，2011 年第 1 期，頁 1-9。

鄭珉中主編，《故宮院藏文物珍品全集．23．璽印》，收入於《故宮院藏文物珍品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康熙起居注按檔案原貌掃描影印出版。

三、報紙

王琳琳、李永康，〈北京國子監〉，《中國文物報》，2008 年 7 月 30 日。

楊湘鈞，〈御匾學問大：拿下御匾毛毛的　想出新匾蓋舊匾〉，《聯合報》，2011 年 1 月 31 日，A5 版。

楊湘鈞、李光儀，〈台南孔廟　馬匾連 3 錯　一放放 2 年〉，《聯合報》，2011 年 1 月 31 日，A5 版。

〈馬錯贈「死人匾」被批「不尊孔」〉，《香港文匯報》，2011 年 2 月 1 日，A22 版。

四、網路

「照片中國　高清晰老照片」網站 www.picturechina.com.cn（檢索日期 2013 年 3 月 30 日）

越南文廟圖片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fedb60100o11q.html（檢索日期 2013 年 2 月 26 日）

The Imperial Plaque "Model Teacher for All Ages" at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Tainan: With a Discussion of Kangxi and the Form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Standard for Imperial Plaques in the Early Qing

Chen Fang-m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rteen imperial plaques are hung at the Dacheng Hall in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t Tainan. The earliest one is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by the Kangxi Emperor, being also the largest as well. The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imperial plaque is not only found in Taiwan, but also in contemporary and later versions at Temples of Confucius in China, such as those in Beijing, Queli in Shandong, Jingyin in Jiangsu, Huangyan in Zhejiang, Deqing in Guangdong, Pingyao in Shanxi, and Zizhong in Sichuan. Not only did it cross the seas to Taiwan, it is also in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Vietnam, but not at the Yushima Seidō in Japan or in Korea.

Judging from the writing format and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 limited number of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plaques made,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style of writing had become standardize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minor differences among them, they might be the result of copies done at different times and co-existed side by side (see the following discussion). In any case, the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plaques form a cultural image that is difficult to separate from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This cultural image, despite having a distinct area of distribution, has a level of circulation over time and place that cannot be overlooked. Since the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imperial plaque at Queli in Shandong was destroy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one at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Tainan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precious along with its related textual materials, reflecting not only the history and cultural artifacts of Taiwan, but also how the Kangxi Emperor in the early Qing took the unprecedented step of establishing his political will within the sacred space of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and spreading it to other Temples of Confucius, forming a standard of imperial plaques for the span of the Great Qing Empire. It also shows how large-scale cultural objects both

centrally and locally underwent visual transformation along with their displacement and circulation over time and space, their spread further involving a background political motivation, whic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study. Research on cultural artifacts at the Temple of Confucius in Tainan also involves non-movable objects, such as architecture.

Keywords: "Model Teacher of All Ages," imperial plaque, Kangxi, "Treasure of Vast Fortun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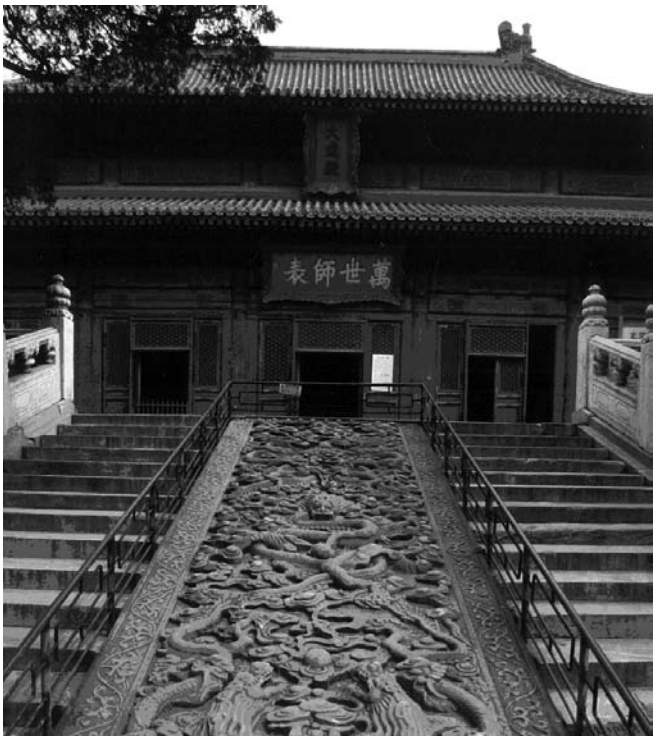

圖1.1　北京孔廟匾額　取自陳傳平　《世界孔廟》　頁56

圖1.2　山東闕里孔廟匾額　取自陳傳平《世界孔廟》　頁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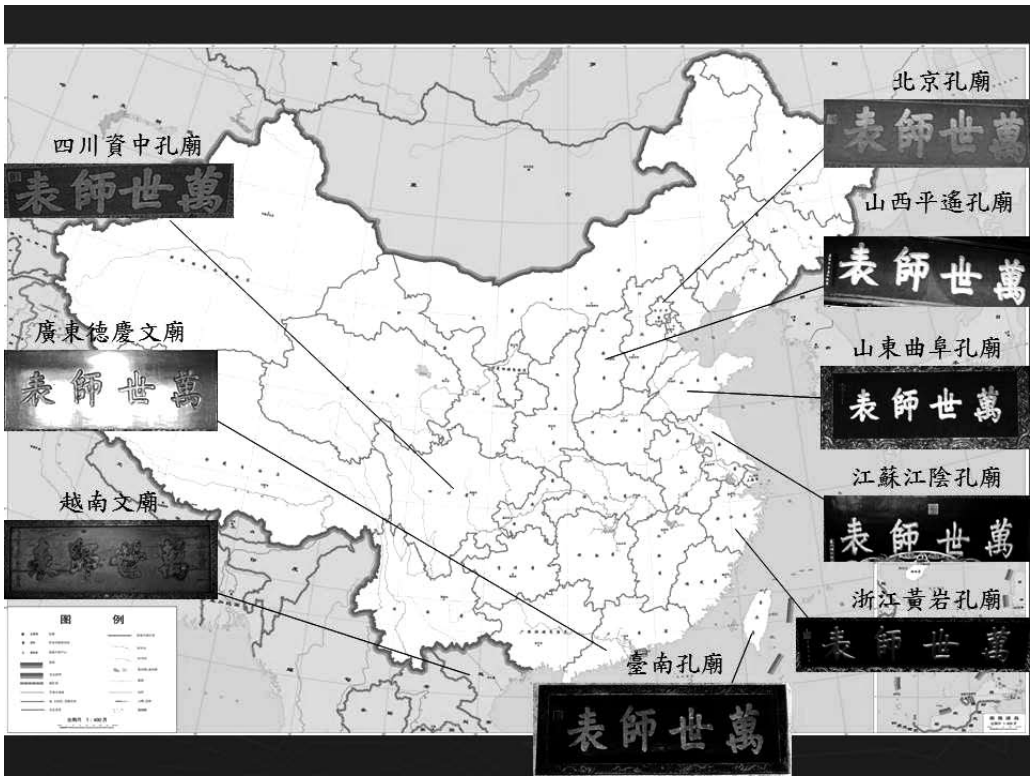

圖1.3　「萬世師表」御匾分佈示意圖　羅玉梅、吳俊彥製　取材自陳傳平《世界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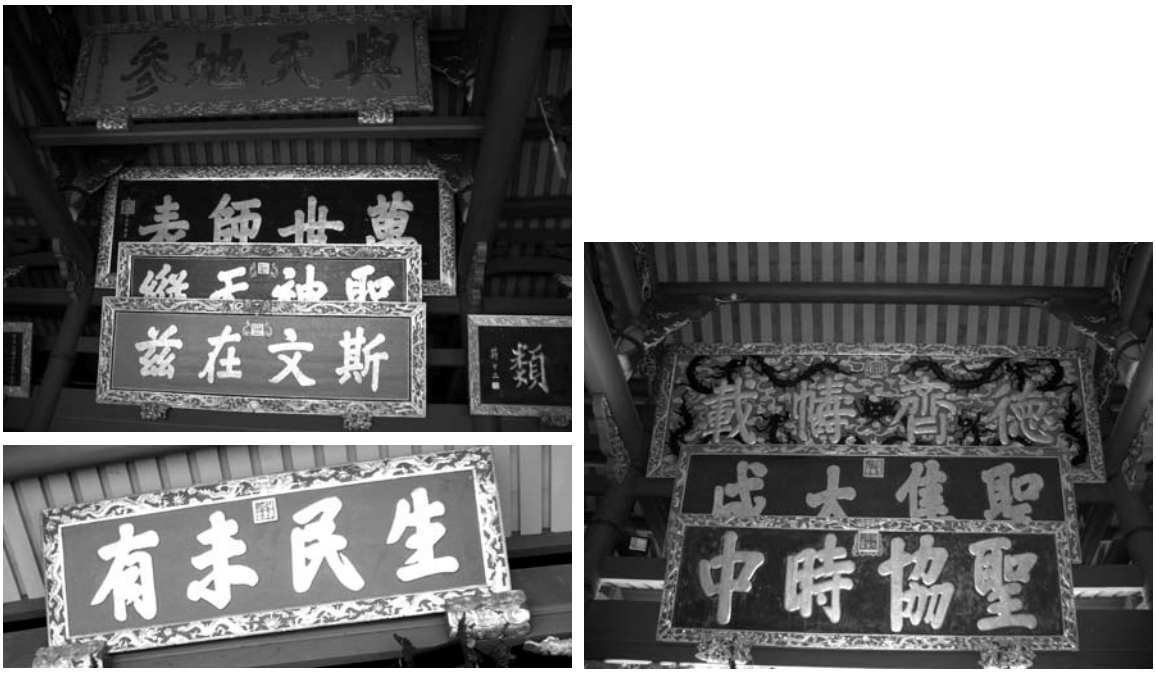

圖1.4　臺南孔廟歷代清帝御匾　康熙「萬世師表」、雍正「生民未有」、乾隆「與天地參」、嘉慶「聖集大成」、道光「聖協時中」、咸豐「德齊幬載」、同治「聖神天縱」、光緒「斯文在茲」　作者自攝

圖1.5　臺南孔廟總統御匾　蔣中正「有教無類」、蔣經國「道貫古今」、嚴家淦「萬世師表」、李登輝「德配天地」、陳水扁「中和位育」、馬英九「聖德化育」　作者自攝

圖2.1　臺南孔廟大成殿康熙御匾　作者自攝

圖2.1.1　左邊八小字：康熙甲子孟冬敬書
作者自攝

圖2.2　臺南天妃宮御敕龍匾「輝煌海澨」　作者自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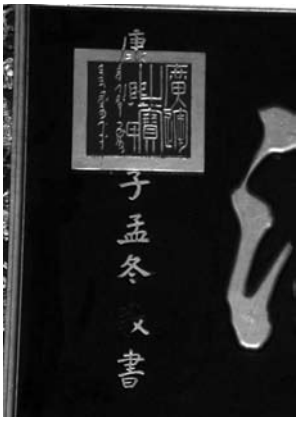

圖2.2.1　左邊八小字：康熙甲子孟冬敬書
作者自攝

圖3.1　文革時遭破壞的「萬世師表」御匾　楊克林編著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　頁160-161

圖3.2 山東闕里孔廟的「萬世師表」 孔子故里編輯委員會編 《孔子故里：東方智慧的文化殿堂》 頁75

圖3.3 北京國子監「萬世師表」御匾，感謝臺灣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許雅惠提供現場拍攝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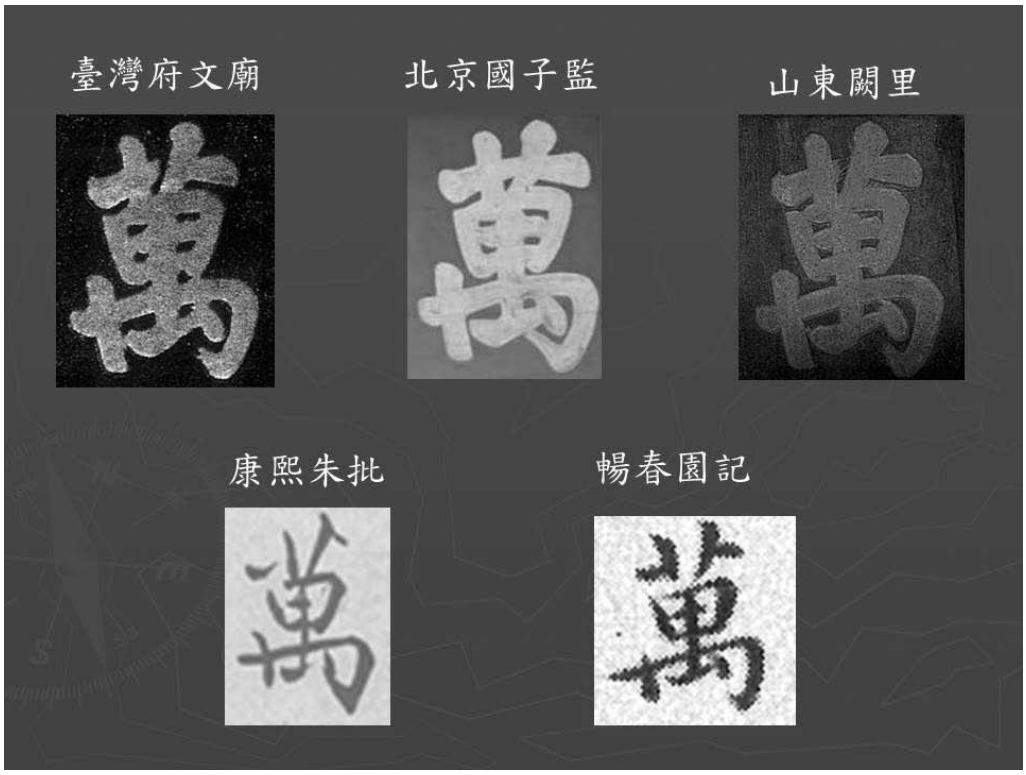

圖3.4 「萬」字剪字表

圖3.5 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璽印
王惟中攝

圖3.6 臺灣府孔廟「萬世師表」御匾璽印拓本
作者自攝

圖3.7　乾隆二十五年「廣運之寶」印璽
鄭珉中主編　《故宮院藏文物珍品全集．23．璽印》　頁209

圖3.8　北京國子監「萬世師表」璽印
許雅惠攝

圖3.9　「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上璽印拓本　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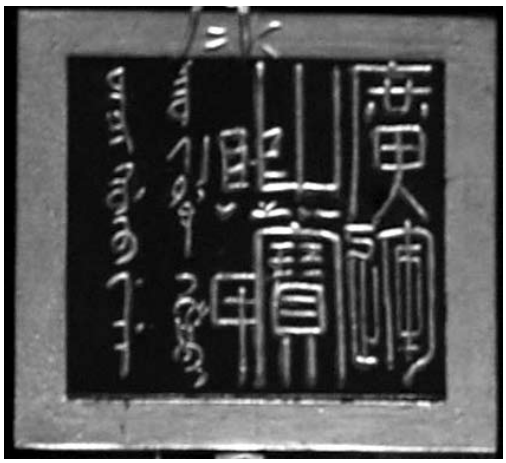

圖3.10　臺南大天后宮「輝煌海澨」御匾璽印
作者自攝